



JIANGDAXUE QIUSHI SHIXUE CONGSHU

浙江大学求是史学丛书

# 传统国家与社会 960—1279年

CHUANTONGGUOJIA  
YUSHEHUI

包伟民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浙江大学求是史学丛书

# 传统国家与社会 960—1279 年

包伟民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国家与社会 960—1279 年/包伟民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浙江大学求是史学丛书)

ISBN 978-7-100-05910-7

I. 传… II. 包…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960—1279—文集 IV. K2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4736 号

**本书承浙江大学 211 工程二期重点项目  
“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经费资助出版**

**传统国家与社会**

960—1279 年

包伟民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910-7

---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25.00 元

## 邓门从师杂忆(代前言)

作者按:此文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一书,遂以代作本书前言,在交待师门所出之余,主要因为本书学术基础,大致不出先师教导的精神,文中所强调的几个要点,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全书主题与立论的倾向。故形式虽或略有别样,文意自以为合适。

1985 年 9 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师于邓广铭恭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自此至 1988 年秋季毕业,我得以奉侍先生左右,日聆师训。三年的耳提面命,使我从一个对史学只有一知半解的年轻学生,成了真正走进史学大门,基本能从事独立研究的史学工作者。邓门从师三年,是我就学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今天回想起来,先生教导学生之循循善诱、德业兼及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早在进北大前,就耳闻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因此,我初入先生之门时,心理上可以说真正是既敬且畏。但没过多久,“敬”之心与日俱增,而“畏”之情则日渐消失。因为先生所严唯在治学,其他方面,则十分和蔼可亲。说起先生的严格,当时我们几个学生心中有一件事十分明白,撰写学术论文,诸如论题不当、逻辑混乱、文理欠通、史料有误等等差错,这一切都会招来先生毫不留情的批评,绝不可能通融过关。就是最基本的用词、句逗等写作基本功方面,

也无从偷懒。我因为一手字写得太差,受到先生多次批评。用先生的话来说是不要求写得好看,但要求写得清楚。记得有一次先生还特意从书橱里找出他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听周作人讲演所作的笔记,给我观摹。先生这一切的“严”,实出于迫切希望学生成才的慈爱之心。我们这些学生,如果说今天在史学领域或多或少有一些成绩,无一不受赐于先生的严格要求。但在治学之外,先生对年轻学生在生活等方面的关心与爱护,却更像是一位宽厚的长者。记得当时我为了避开交通高峰,在学期结束时每每提前几天离校,向先生请假,他一概准许放行。

为中国史学界多培养几个学生,是先生晚年的一大心愿,也是花费先生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我考进北大时,先生招收研究生已有多,门下已毕业与正在读的硕士生不少,在读的博士生也已有几位。但奇怪的是,先生似乎并不鼓励他自己的硕士生继续做他的博士生。后来听师兄张希清的解释,才使我明白所以然:先生为了多培养几个学生,希望多招收几名外校的学生。至于北大已在读或毕业的硕士生,认为既已在自己身边,一样可以加在指导,至于学位不学位的,并不重要。这当然也可看出先生在学术上重实才轻虚名的态度。正因为此,先生对于门下的弟子,只要尚堪造就,总是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希望他们能留在北大,留在自己身边工作,用以加强北大宋史研究的力量。但事与愿违,这十几年来世事的变化,弟子竟是走的多留的少。这也是我这十年来一直感到愧对先生的事情。

当我进北大时,先生已不再正式开课,我主要是通过定期向先生汇报读书心得,来得到先生的指导。不过先生十分注意让我们多向历史系其他教师求教,要我们多选听一些名师的讲课。记得

我曾选听过田余庆、王永兴、张广达等老师的讲课。这里只说先生本人指导我们这些学生的一些具体方法。

我在硕士生时期,就一直关注宋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所以先生在我入学后,与我谈论当时宋史研究概况,经常提到有关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个具体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他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起初我并未在意,后来慢慢领悟到这是先生在向我布置任务,才专心钻研起来,并试着写出一篇论文,交先生审阅。第一稿显然并未达到先生的要求,他不仅指出了我论文的错误,并专门向我讲解了论文所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让我继续修改。得到这些具体的指点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终于真正理解了这个问题。论文第二稿交上去,就得到了先生的首肯。后来我从其他师兄兄弟处了解到,他们每人都有过这样的“命题作文”的经历,才体会到这实际上是先生培养学生的一个办法:通过命题作文,一步步地将学生引入史学之门,手把手地教给他们做具体研究工作的基本功。同时,先生也有意通过论文写作,看看新入门的弟子到底是否堪与造就。先生看重的是学生的实际研究能力,而不是他们考试的成绩。

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可以说是我从先生处所学到的几项最重要原则之一。记得有一次我到先生处汇报读书心得,那几天我正在读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先生问我有哪些发现,我提到了对书中所记关于南宋某一地方官设置问题的一个归纳性看法。不料先生说:这不过是一个支节而已,读书应该关心大问题,从大处着眼,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今天我自己教书时,总是把先生的这一番话,作为读书的一大诀窍,告诉学生。细

想起来,先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所强调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无不是从大处着眼而提出来的。具体落实到宋史领域,先生所一再强调的不应孤立地研究宋代,而应该对当时中国地域所存在的辽宋金夏几个政权同时展开研究的看法,就是一个例证。

说到从大处着眼,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先生一直所强调的理论运用应该实事求是的问题。正如先生在为他的学术论著自选集所写前言中所说:“我所写出的文章,只是阐发我自己的见解,而绝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式的作品;而且只是实事求是地,以符合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绝不去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先生在平时对我的指导中,多次谈到了自己对所谓土地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宋代的货币地租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先生确定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全过程中地位问题的重要论据。根据我对先生这些意见的理解,就是我们不应该按照欧洲历史发展的模式,非得要生硬地在中国找出一个与之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本质而言虽是一元的,但其在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却是极其多样化、极其丰富多彩的。背离历史本质,用中国历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去印证理论大师学说之正确,实际上只能是帮倒忙而已。这些年来,我自己在史学研究中,也是力图坚持这一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

从细微处入手,是指研究历史应该正确处理史料而言。这也是先生所提出实事求是治学原则的第二个方面。重视对史料的校勘与考订,去伪存真,以得到正确理解,接近历史的真相,是我国老

一辈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先生在这一方面给我的印象尤深。学生提交的论文,其所征引的基本史料,先生都不厌其烦地一一予查对原书,其工作量可想而知,但先生从不马虎。记得有一次,先生在看过我的一篇论文后,特意对我说,其中有两条资料所引到的书,放在书橱上层,太高拿不到,没有查对,要我到图书馆再去核查一下。先生不仅在指导学生研究工作中特别强调从细微处入手的重要性,他自己正是这样从细微处着手来影响学生、感化学生。现在,我自己在从事教学工作时,每当有懈怠情绪滋生,就会不自主地想起先生,勉励自己。

说句实话,邓门从师三年,当时我更多的是将先生视为严师,其他方面考虑不多。离开北大后的这十年间,我对先生学术思想的体会与高尚人格的认识,才更全面、更深入。近年来,先生对一些学术问题之坚持原则,近乎于固执,以及对纷烦世事所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实有他人难以企及之处。而这正是我心目中的先生。

# 目 录

|                                  |     |
|----------------------------------|-----|
| 邓门从师杂忆(代前言).....                 | 1   |
| 一、宋代的粮食贸易 .....                  | 1   |
| 二、论宋代折钱租与钱租的性质.....              | 27  |
| 三、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 51  |
| 四、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                | 72  |
| 五、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 .....          | 123 |
| 六、宋代的上供正赋 .....                  | 142 |
| 七、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 .....               | 166 |
| 八、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 .....    | 210 |
| 九、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 .....             | 229 |
| 十、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 .....               | 262 |
| 十一、宋代陈希亮家族及其迁徙考 .....            | 282 |
| 十二、中国 9 到 13 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 | 298 |
| 十三、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 315 |
| 十四、宋代技术官制度述略 .....               | 334 |
| 十五、沈括事迹献疑六则 .....                | 351 |
| 十六、大觉国师入宋求法史事杂考 .....            | 360 |
| 十七、书生睿智、遗世绝唱.....                | 373 |

## 2 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 年

|                      |     |
|----------------------|-----|
| 十八、“唯灵是信”的历史表象 ..... | 378 |
| 引书简称 .....           | 386 |
| 参考文献 .....           | 387 |

## 一、宋代的粮食贸易<sup>\*</sup>

粮食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品,同时也是它最主要的商品。粮食商品率的大小,可以成为测量自然经济演变的最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由于农业经营一直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主体,以及作为集权国家统治中心的城市的繁荣,粮食贸易向来比较活跃。自先秦直至明、清,粮食贸易的发展虽然十分缓慢,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的,其中宋代就是一个进步比较明显的历史时期。因此,宋代粮食贸易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和研究,以期探讨宋代粮食商品化的程度,乃至宋代社会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全汉昇先生与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的著作。

全汉昇先生的《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一文,首次全面分析了南宋时期稻米生产与贸易的状况,认为当时的四川、湖南、江西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都是重要的稻米产区,自给有余,可以经常大量地运销外地。而湖北、两淮则是稻米的输入区。沿海一带,浙西、两广也把大量余粮运销福建、浙东这两个缺粮区。全先生的结论是:从南宋时期粮食贸易的发达,可知“当日交换经济的势力已经非常雄厚,至于自足经济的踪影则已日趋于消灭”。斯波先生在他的《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宋代的粮食已成为商人

---

<sup>\*</sup>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41—56页。

在各大经济区之间大量地长途贩运的一项重要商品，并且已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市场。<sup>①</sup>

本章试图在全汉昇和斯波义信两先生著作的基础上，从决定宋代粮食商品化基本因素、各大经济区域间及区域市场范围内粮食的交换与流通，以及有关宋代粮食贸易的几个有意义的现象等方面，对当时的粮食商品化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提出与两氏不同的见解。

### （一）决定宋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几个基本因素

宋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的一家一户经营方式。

宋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生产关系较之前代都有不少变化和发展，例如随着大土地私人占有制及租佃制度的发展，自耕农的比率减少了，而租佃农的比率却大大增加。但无论是自耕农还是租佃农，他们的生产经营方式无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因此为换取那些他们自身无法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例如盐、酒、犁、锄，为完租纳税，他们都不得不经常地与市场发生联系，出卖自己的主要产品——粮食。本节姑将小农与市场的交易概括地称之为米盐交易。米盐交易并非宋代特有，而是小农经营从来就有的一种伴生现象。如果说宋代较之前代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由于宋代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小农与市场的这种联系更为紧密、更为广泛了。农业生产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粮食贸易的两个基本特

---

<sup>①</sup> 第22、142、167页。

性:其一,它决定了农业余粮输出的细碎性。这就是说,每户小农每一次投入市场的粮食数量不可能过多。所以尽管某些地区粮产颇高,初级市场的米盐交易表面很是繁忙,但其所能聚集的商品粮是有限的。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各地区商品粮输出的广泛性。任何农业生产区,无例外地都会有一定的商品粮输出,不管它的输出量如何,或者其输出所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我们在观察宋代粮食商品化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一特性。

宋代由于大土地私人占有制与租佃制的发展,农产品也大量地以地租的形态集中在地主的手中,因此地主出于种种需要而出售租米是商品粮的重要来源。地主出售租米,当然不会仅以步担或斗升计,即一般不存在前述小农出售余粮的细碎性,但仍然具有地域上的普遍性。

不应忽视,除生产经营方式之外,某种产品的商品化还必然受到其他各种与之密切联系的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分析宋代粮食贸易问题时尤其应该注意的,就是宋代各地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运输条件以及粮食消费市场构成的有关特点。

粮食属民生用品,消耗量大,粮食的运销须以廉价的运输为先决条件才有可能赢利。宋代运粮有陆运与水运之别。陆运成本极高,依靠陆运是不可能发展较大规模的粮食贸易的。宋代商人贩粮主要依靠水运,不过水运的成本也不低,北宋每年从东南六路运粮北上京师开封,费用就十分惊人。据端拱二年(989)国子博士李觉的说法,当时东南漕粮每石运费不啻三百钱,侵耗损折等复在其外,若总计运粮工脚,不减五百钱,是则每石运费就超过了东南每石的粮价。<sup>①</sup>南宋时

---

<sup>①</sup> 《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四月条。

期,袁州与临江军接界,两地府治相距不到三百里,且有水道相通。绍兴年间(1131—1162),袁州民户支移苗税于临江军,都不得于本地贱价粜米,携金帛至临江军贵价籴米输纳,其费数倍,说明运粮费用必定比这还要高。<sup>①</sup> 因此,基于宋代的运输条件,粮食还是属于“重滞之物,不可从远处兴贩得来,须本处土地所生,方可计置”。<sup>②</sup> 不过在这一前提下,应该看到两宋各地地理条件有较大差异,陆运船载的运输条件也不同,尤其在那些靠近大江、运河的地区,运粮比其他地区要方便得多。

许多学者早已指出:宋代商品粮食主要供城镇人口消费。也就是说,宋代商品粮的运销,无论是短途的,还是长途的,都无不以城镇为主要对象,即便在号称岁仰客籴的缺粮地区也是如此。我们在估计商品粮流通总量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消费市场这一特点。宋代各地遏籴之风屡禁不止,有人认为多由“州县各顾其私,听信城市之民妄言,‘不可放米出界’”,<sup>③</sup>目的是防止本地粮价上涨。官府赈济灾荒,也大多局限于城镇,宋高宗赵构(1107—1187)说:“近世拯济,止及城郭市井之内,而乡村之远者,未尝及之。”<sup>④</sup>而城镇居民究竟有多少人仰给于商品粮的供应,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近代研究宋代粮食贸易的学者无不举南宋临安米铺日粜三四千石的例子,以证明商品粮供应额之巨大。其实就按此数计算,临安“仰籴而食”者不过“十六七万人”,<sup>⑤</sup>另外食米自

① 《宋会要》食货六〇之四八。

②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乞不添屯军马》。

③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二六。

④ 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一。

⑤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杭城食米》。这一记载约为南宋晚期理、度之间史事。参见《梦粱录》卷一六《米铺》,《嘉靖仁和县志》卷七。

给的人户仍当以数十万计。临安系南宋行都，寄居的官吏、势家很多，外地州府城郭人口的组成当有所不同，一般市民的比例应该略高。但临安仰食而食人户与有米之家比例悬殊的例子毕竟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启示：按宋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估算当时粮食商品化程度时，要打一定的折扣。

## （二）宋代粮食长途贩运的主要形态

根据上述决定宋代粮食商品化程度三方面的基本因素，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除去个别例外，宋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各大经济区域大体都能够做到粮食自给。

在中国古代，以农为本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想，更是一种历史的现实。当人类还处在为生存而努力的阶段，衣食确乎是头等大事。尤其从北宋开始，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使得各地不得不首先经营粮食，以养活本地人口。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明、清，严重阻碍了农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宋代各大经济区域，不管它们各自有着什么样的专业特产品，其共同之处就是以“养生送死，皆自田出”<sup>①</sup>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而这种小农经济，如前文所说，又必然与市场发生一定的有机联系，以他们不多的余粮，甚至不全是余粮，来换取其他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从小农手中一点一点汇集起来的粮食，包括地主出售的租米，筑成了某一地区其他一切经济、文化、政治活动的基础。宋代各大经济区域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主要就决定于这一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太湖流域经济、

---

①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六《上运使孙司谏书》。

文化的发达,是基于此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之上的,这已经成了学术界的共识。从总体平衡看,某一地区商品粮的需求量,应该与它的供应量相适应。通观宋代各大经济区域各自的农业与城镇工商业的发展程度,可以发现历史的实际正好表现了这种互相的适应。

但是,在生产与消费这种基本适应的前提下,由于种种内在的或外来的原因,某些地区的粮食供需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或盈或亏的现象,这就是文献中常记载的“产粮之地”或“缺粮之地”的情况。决定宋代某一地区粮食盈亏的因素,与其说主要是农业发展的水平,还不如说主要是人口密集的程度。

宋代广西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相对落后。但广西一直土旷人稀,城镇工商业不发达,对商品粮的需求不广,所以,一方面,直至南宋末年,仍有人认为“广西出米有限,漕司常年和籴不过二三万石”。<sup>①</sup> 另一方面,广西自北宋以来一直就是产粮之地,有余粮运销广东。如周去非所说:“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谷贱,其实无积贮尔。”<sup>②</sup>南宋时期淮南遭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比北宋明显倒退,耕作粗放,不少土地荒芜,所以全汉昇先生将它列入缺粮地区。而实际上当时淮南由于人口剧减,常年并不缺粮,甚至还有余粮通过运河南运。据史料记载:“两淮土沃而多旷,土人且耕且种,不待耘耔而其收十倍。浙民每于秋熟

① 李曾伯:《可斋杂稿》后卷九《回宣谕奏》。

②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常平》。

以小舟载其家之淮上，为淮民获，田主仅收什伍，他皆为浙人得之，以舟载所得而归。”<sup>①</sup>南宋政府因此经常在淮南和籴粮斛供军，长江以南的某些州府，例如镇江府，也需要籴淮南米接济食用。<sup>②</sup>南宋湖北路也被全先生列为缺粮地区，但事实上湖北的情况与淮南相似，“地广人稀”，“每到丰稔之年，仅足贍其境内”，<sup>③</sup>若非灾荒歉收，产粮也得以自足，政府并常年在湖北籴买军粮。

然而，宋代见诸记载的几处缺粮地区，其农业生产却大都比较先进。造成粮食供应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口的密集。其中又有两类不同的情况：一是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在某一地区聚集大量非农业人口，例如形成大范围的城镇，或驻扎重兵等，从而造成本地粮食供应的不足，如北宋的京畿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宋沿长江中下游一线驻扎重兵，因而除行都临安外，也形成了几个范围较大的城市，例如浙西的镇江府，江东的建康府，两城都位于先进的农业区，但仍因驻军过多，不免仰给于上游乃至淮南的客籴。另一类型则主要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人口密集而又产粮不足。这是指福建路及浙东路的部分地区。福建路是宋代有名的缺粮区，但福建农业生产水平并不低。北宋秦观（1049—1100）说：“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sup>④</sup>南宋陈傅良（1137—1203）的《桂阳军劝农文》也将“闽浙”相提并论，作为农业生产技术先进的榜样，来勉励桂阳军农户。<sup>⑤</sup>福

① 《朝野杂记》甲集卷八《陈子长筑绍熙堰》。参见《宋会要》食货四一之一一—等。

② 《宋会要》食货四〇之五五、四一之一五。

③ 彭龟年：《止堂集》卷六《乞权住湖北和籴疏》。

④ 秦观：《淮海集》卷一五《财用下》。

⑤ 陈傅良：《止斋文集》卷四四。